

长篇小说《瓊家花园》聚焦七十载平民生活史,专访作者叶兆言: 我永远不要做一个“卖土特产的”

本报记者 严粒粒



《瓊家花园》。

译林出版社 供图

长篇小说,文学的项上明珠。全面复杂、人物丰富、情节跌宕、结构精巧、哲思深入……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因而往往被誉为“时代的百科全书”。

不过,荐读一部长篇小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身处讲求效率的今天,且不论创作的好坏,普通读者已然少有耐心愿意去品读一本“大部头”了。这对读者与作者,乃至文学发展来说,都无疑是一种遗憾。

近日,叶兆言全新长篇作品《瓊家花园》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现有十四部长篇小说中,体量最大、故事时间跨度最长的作品。以南京城南一座老宅院为背景,故事从20世纪50年代讲到了今天,书写了两个家庭,三代人悲欢交集的人生。书的推广语称其是“时代的记忆”,是“平民生活史”。

可千万不要被宏大的定语所吓退。读过你就会发现它的轻盈、平实、真诚。

抛去技巧、立意之类专业角度不谈,从某种程度上,“好读”是《瓊家花园》最显而易见的重要特色。别看它厚,如果你愿意,几乎不用歇一口气,花个一天两天就能顺畅地读完。用豆瓣上一位读者的话说,“文笔无比的丝滑,读起来跟吃打卤面一样吸溜吸溜的”。

正是这种痛快十分的体验,让人仿佛回到了在被窝中挑灯夜读的学生时代。那激情澎湃、欲语还休的心境,是文学才能掀起的波澜,实在令人怀念又感慨。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好读”的另一个近义词是“通俗”。“通俗”不是一个好的评价?各有各的看法。叶兆言倒是非常坦率,曾撰文《小说的通俗》直抒胸臆,说“小说本来不是什么大学问,小说本来就是通俗的东西”。

如果说,“被看见”是文学实现其价值的前提,那么《瓊家花园》胜就胜在了这份“俗”。

小说的角色都是普通而平凡的“俗人”,如每一个你我,或者身边亲友。

瓊天井,一个像“阿甘”一样的傻小子,看起来似乎除却成功和喜欢的姑娘共度一生之外,其余一事无成,没有享受任何主角光环,甚至还有些糊里糊涂——糊涂到在高考恢复后考上了好大学又没去报到,又糊涂到连那位姑娘给他“戴绿帽”都毫无察觉。

那些配角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是一群名为工人、保姆、个体户、教师、警察、干部、知识分子等等的市井小民,没什么身份显赫的贵人、天赋异禀的奇人,或是刚正不阿的伟人。他们不好不坏,游走于人性的灰色地带;他们不算成功也没有跌入尘埃,普通人大多如此状态。相比遥不可及的“大人物”,这些“小人物”更容易被社会风吹草动波及,他们所面临的抉择、困境、心态能与大多数人达成共鸣。

小说的故事听起来也都是

些“俗事”,尽是时代滚滚车轮碾出的家长里短。

就像莫言和高密、汪曾祺和高邮、张爱玲和上海,叶兆言是和南京深度绑定的作家。他书写了南京城四十余载。不过,除了后半段出现的“盐水鸭”,《瓊家花园》的南京味并不太重。实际上“盐水鸭”换成“姜母鸭”“北京烤鸭”也未尝不可。就连故事发生地“瓊家花园”究竟在哪儿也不甚重要。用叶兆言的话说,“任何有一点历史的城市都会有这样古老的、有变化的、有故事的街区”。

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出国潮、下海经商、国企改革、棚户区改造……那些推动故事发展的历史背景,更是一群人的集体经历。这群亲历过的人,正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能交流,也能干事。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或多或少少的痕迹,也多多少少左右着他们的人生,又牵扯起我们的命运。

这种普遍性使得读者能够很轻易地走进作者构建的文学世界,继而以自己的经历做链接、做延伸,由此及彼。

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叙事也保持着平视的角度,说的都是大白话,没有讲什么人生态度、金玉良言,更没有开出“上帝视角”,带着读者把起因经过都说明白、捋清楚。它留白给了读者巨大的空间,去想象,去思考,去填补那些言而未尽的情节。这是对读者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种敦促与尊重,也是对真实生活境况的模拟——生活的苦乐不尽相同,谁又能指导谁呢?

也许,这也是叶兆言为什么认为《瓊家花园》与梁晓声《人世间》相比,世界观和文学观并不不同的原因。比起带有俯视视角、知识分子意味的“人世间”,他还是更喜欢“人间”和“民间”。

前不久,我怀着邀请“大咖”的心情,忐忑地和叶兆言约专访。过程比想象的顺利太多。他认为,这是对出版社出版本书的尊重,对记者报道文学创作的尊重。又想起早前,他曾在别的媒体采访时说过这样两句话。

一句洋溢着确凿的自信:“这是我真正看家的书。”

一句微澜着无奈的卑微:“今天阅读我作品的人已经不多,少得可怜。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惜,珍惜自己还有写作的能力,还有写作的机会。”

身处讲求效率的今天,耗费好几年,写一部长长的小说,把时代写得举重若轻,又把人生写得欲说还休,还有意无意留给了读者发挥的空间,很难,也很难得。

现在,叶兆言——这位大名鼎鼎的叶圣陶的孙子、知名作家叶至诚的儿子,成长在不折不扣文艺之家的“继承者”;既在厂子里拿过好几年铁钳,又是终成拿笔杆子过活的“跨界者”;年近七十还保持着“战斗热情”的文学圈公认的“拼命三郎”;会跳出来讲“纯文学从来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这么说,于是也难得有人跳出来揭穿”的“实在人”——诚挚地捧出了一部《瓊家花园》。

它值得我们去读一读。这费不了多少时间。

文学创作的难与易

记者:在这样一个年纪,耗费精力去投入这样一部宏大作品的动力是什么?

叶兆言:说不上什么动力。作家就是一要和“写不出来”作斗争,和“写好”作斗争。《瓊家花园》只是我连续劳作的其中一步,就像运动员一样打了一场比赛而已。当然,随着年龄大了,体力会有点跟不上。所以比较笨的办法就是增加每天的工作量。

可以明确的是写作并不容易。都说“便宜没好货”,写得累,写得不容易这是正常的,艺术就是克服困难。我能接受精力耗费的“写不出来”,但一直觉得“写作容易”是个大问题。

记者:要怎么理解“容易的写作”?

叶兆言:因为写作一旦容易了,就意味着你可能在“驾着轻车走熟路”。这是写文章的一个大忌。媒体总说我关注南京、熟悉南京、熟悉民国。这种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种“麻醉剂”。文学创作不应该轻车熟路,一定要有许多“不痛快”“不适应”才有意思。

当然,一个作家也许已经费尽心思变花样了,在读者看来可能也没“跳出去”。但是我必须要有“要跟自己过不去”的想法,并为此做出努力。如果一篇小说没有让我觉得有不好驾驭的地方,那就是有问题的。

记者:您觉得《瓊家花园》不好驾驭的地方在哪里?

叶兆言:每一本书都有不好驾驭的地方。要说《瓊家花园》有什么不一样,主要是技术操作的问题。

比如写民国小说,我毕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最关键的是要把不熟悉的历史尽可能写真,要让读者觉得“这家伙好像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真和假”对于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而《瓊家花园》描写的时间和空间我都太熟悉了。我就想把它弄得跟假的一样,让人觉得这故事和我本人没关系。我其实不希望人们评价《瓊家花园》“写得很真实”,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虚构小说。

记者:把小说写“真”不好吗?

叶兆言:小说是虚构的,“真实”不应该是它唯一的评价标准。都说“真亦假时假亦真”,这个“真假”是可以相互作用的。

卡夫卡写《变形记》,把人变成甲虫。这件事情显然是假的。但是他把人变成了甲虫以后的感受写得跟真的一样,让读者能体会、理解、代入这样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文学艺术要表现,要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的真实处境,而不是故事的真实。

人物塑造与“爹味”

记者:《瓊家花园》主角瓊天井很平凡,也有点窘迫,他的人生轨迹也几乎是“被动接受”的结果。但是您很喜欢他。您觉得这样一种人物的闪光点在哪里?

叶兆言:写小说人物,我当然希望他们身上有闪光点。不过,我觉得瓊天井身上可能既有贾宝玉的影子,又有薛蝌的影子,三言两语说不太清楚。读者可以自己体会。重要的是我给了他“生命”,就必须要把他“活起来”。

我清楚地知道瓊天井是个理想人物。现代人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去痴迷、踏实、不计回报地只会爱一个人。但就算99%的人不是这样,也还是会有那1%的人存在。瓊天井就是这样一个人幸福的人。

记者:怎么理解瓊天井的“幸福”?

叶兆言:说老实话,我一直认为“爱别人的人”比“被爱的人”更幸福。我这段时间在岭南大学驻校授课,让同学们写一封信书。我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表达的都是“希望别人来爱你”。

记者:是太“被动”,没有掌握“主动权”。

叶兆言:这和主动不一样。他们没有把那种纯粹的天性,单向度的、像阳光射出去一样不图回报的爱展现出来。好多年轻人在表达“你爱不爱我,我爱不爱你”,这是一种交易。所以我一直说瓊天井是“假”的。我需要在他们身上花很大的力气,让这个一个假的人立起来。

记者:您希望读者成为瓊天井一样理想状态的“幸福”的人吗?

叶兆言:完全没有。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词叫“爹味”,是吧?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在小说中间“爹味”太重,不要有太多评判在里面,这是很要命的事情。

我比较担心的是,读者在阅读上会有一些困惑。比如瓊天井不小心爬上祖宗阁,意外看到女性更衣,感到大为震撼的事情。它反映的是那

个时代的真实存在,不是什么低级趣味。我担心瓊天井留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不正经的男孩”。

今天,大家的阅读可能比较粗糙。其实我在小说里面埋了许多需要深究的细节。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阅读的时候,把它们背后的深意给挖出来。

读者评价与作家使命

记者:《瓊家花园》面世有一段时间了,也开了作品研讨会。对您来说,哪些评价让您印象深刻?

叶兆言:不能说我很在乎读者意见,也不能说我不在乎。但问题是我的习惯是一个作品写完了,得赶紧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作状态。我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人总是很虚荣的”。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就拿我在岭南大学做驻校作家来说,我觉得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每周要讲一节课,我得写讲稿。写完讲稿,年纪太大了又背不下来。太累。

当然,有时候也有意无意会看到一些评价。对于那些没说到“要害”的评价一笑了之就行。也有很尖锐的批评家,真是看到你的弱点,需要严肃对待。

记者:哪些评论戳到您的“要害”了?

叶兆言:有两个人说的话我经常想起来。

一个是王朔。当时别人转给我一篇他的文章,大概意思是:像叶兆言他们那样的江南才子,日子过得太舒服了。(记者注:王朔曾在访谈时提到:“苏童、叶兆言,在南方的生活太舒服了,作协像个大家庭一样,所以文章有闲适气、才子气、六朝气,小说也就一般般。”)我会把他的话来提醒自己,不要过得太舒适,不要才子气,不要自我得意,要老老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干活。

还有一个顾彬(记者注:德国汉学家)。他的很多观点我是不同意的,但有一句话的确是悬在我脑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说: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是重复自己。

我总是在提醒自己不要重复自己,我们从事的文学必须是要有追求的,是世界性的。南京作家写的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中国文学又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世界文学像高山一样竖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努力往上爬,不能停止攀登,不能固步自封。

我的兴趣并不是南京的“盐水鸭”和“鸭血粉丝汤”。我永远不要做一个“卖土特产的”。

记者:您觉得这个时代,身为一个作家的使命是什么?

叶兆言:使命这个词太重太大,一个小小的作家怕是担当不起。作家永远不要高估自己。鲁迅也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我对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老老实实把文章写好,不要装,够真诚,就可以了。

记者:其他就留给后面人评价。

叶兆言:对。但我也在想,一个作家有时候也挺忧伤的。现在看文学的人不如以前多了,很可能我作品根本到不了别人的眼皮底下。

但就像爱情一样,就算有99%的人都不再看了,也还有那1%。这种信念支撑着我:万一别人有机会看到你的小说,你要对得起别人。

记者:接下来的新作会做一些创新吗?

叶兆言:肯定有,这个是毫无疑问。但是我在没有完成以前先不想说。

记者:是小说吗?

叶兆言:当然是小说了。最快出来的大概是在岭南大学上写作课程的讲稿。从理论上说,课要持续到明年1月。

记者:会把上课内容整理成书?

叶兆言:其实也不是整理成书。我是先写成书再讲。这是最笨的办法。

(本报记者 严粒粒 整理)

作者叶兆言。
译林出版社 供图



书评

另辟蹊径的红色叙事

郑晓林

最近,浙江作家纪凤创作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女政委》。我以为,这是一次另辟蹊径的红色叙事。

这部长篇小说以红军挺进师为历史背景。1935年在赣东北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政委刘英,参谋长王蕴瑞,初建时全师538人。挺进师成立后,迅速在浙西南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开创了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35年9月,国民党调集40个团共8万兵力,大举进攻闽浙赣皖边区红军。在战争中,许多领导人和战士牺牲,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遭到破坏。随后,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主力进入泰顺,并在那里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之一,为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段轰轰烈烈的红色历史,在长篇小说中有着直接正面的叙述。当然,作品更多的是在此背景下,通过一支红军伤兵队伍坚持三年的游击斗争,以小见大地展现了红军战士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矢志不渝的斗争精神。小说在史实的叙事中,是经得起历史考证的。在场景的描绘中,不是杨靖宇抗日又勇军所处的雪山黑水、林海雪原,也不是琼崖游击队穿行的椰林遍地、五指山脉,而是武夷大山、括苍山麓的闽浙山区深部,这里有葛根、有团鱼、有钨矿,当然还有戏班袅袅的歌声与琴弦。从这样场景构成历史真实升华上来的艺术真实,是将严谨简明的历史表达,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感、多面立体的形象语言。

中国革命是一座伟大的熔炉,不一样的原料,不一样的路径的人,却都“百炼成钢”。本书作者纪凤对司琴、福建佬等人的成长描写,并不是停留在我们所熟知的吴清华、郭建光等人的红色英雄故事上,而是通过另辟蹊径的独特展现,丰富并丰满了经典文学人物形象的长廊。

一是历史表达的深刻性。一部作品,如果仅仅正面描写中国革命发展壮大过程,那只是一部历史著作,而不是一部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一点是深刻挖掘人在历史发展中,人的觉醒、动能、成长、成功等一系列思想、行为的演进;并且,这种演进化为生动的故事,鲜活的形象和动人的情感来感染读者,从而揭示了历史洪流滚滚向前,直到胜利的必然性。

《女政委》恰恰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早在20多年前,在民政部门工作的作者就一直关注着一群特殊的老人——红军和新四军老战士。他曾经连续七八年到省里几个干休所的老同志家里进行访谈,和他们成了忘年交。在交往过程中,作者深切感受到革命战争年代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洪流的热血激情和奉献精神;也进一步了解到年轻革命者在革命和战争中所付出的极其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他们不但经受着身体损伤和生命牺牲的巨大考验,也经受着人性和情感等精神方面的巨大考验。

特别是一些女性老战士的革命事迹和生命历程,更是给他带来更多的震撼。战火硝烟虽然已经散去几十年,但她们平静叙述的背后,难以掩饰的是她们在革命和战争开始时激情的澎湃、挫折后的痛苦、失败后的绝望、绝境中的奋起、胜利后的安详以及对牺牲战友和亲人的无尽怀念。在这些叙述的背后,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展现出了革命者伟大的人性和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热烈渴望。

这就是作者写《女政委》的初衷,也是我们透过小说叙述的背后,所能够被打动到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和人性光辉的战火青春。父辈们激情燃烧的青春,会引燃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时代的青春。

二是人物塑造的丰满性。有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内核和框架,并不意味着就会有一部很精彩的小小说,需要有一个合理又吸引人的角度来描绘,来摄人心魄。

对作者而言,革命和战争的素材有成千上万。小说当中的这些素材也都有真实的原型依据。他只是作为忠实的记录者,通过人性和情感这条线,把相关的素材串联起来,进行了最朴素表达,并且努力展现不脱离生活真实的那些细节,文学才显得富有质感。中国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是对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重新解构,重塑民族精神。在这场革命中,时代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能置之度外。

这部小说,是一个女性从18岁起往后三十年里的故事,历史跨度从红军时期到抗战时期,再到解放战争直至革命胜利。“女政委”,最先是一位名叫洪仙姑的共产党人在后方医院的职务。这位女政委在小说进行到三分之一时候就牺牲了,但这个女政委的精神力量,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在主人公琴的心里慢慢生根发芽壮大,并且在一生相伴相随,成为她一路前行的指路明灯;洪仙姑的女儿小阳光最后的失而复得,既是文学情节波澜起伏的需要,更是寓意着红色力量的根脉代代相传。

作者受前苏联战争文学的影响较深,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其中的文学理念和美学表达的影响,尽量地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在文字后面,在不动声色之中娓娓道来战争中的女性是如何安放青春与爱情,以及展现生命总是不可阻挡地冲破苦难和灾难。

三是影视IP的兼容性。一个时代的文学,有一个时代的标杆样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发达,都是与那个时代的文化传播力密切相关。当下是影像图片时代,文学与影视IP的兼容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作者曾经创作长篇小说《风中的白果树》,后改编成电视剧《美丽的鲜花在开放》(2010年)。该剧由高希希导演,许晴主演后,获得了较好的口碑。此外,作者还有电视剧《最后一枪》(2012年)、《春风又绿江南岸》(2022年)等影视作品问世。对于这样一位小说、电视剧跨界的作品而言,作者利用了影视创作的一些优势,包括戏剧冲突、对白、悬念、故事推演的节奏等等,有机、恰当地运用在小说创作中,使得小说的整个文学质量、叙事都特别有意思。

我们看到,红军挺进师三年斗争结束后,作者在历史背景的陈述、人物关系的梳理和故事线索的铺垫方面也完成了相应的文学交代。于是,在国共合作、抗击日寇、深入虎穴、回乡剿匪等等的故事叙述高潮迭起,悬念密布,不仅情节推动紧张有序,人物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不断出现反转再反转的艺术效果,一直持续到作品的最后一行。

影视剧最重要的就是人物关系,人物关系理清了,戏就活了。司琴和陈泽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一开始是仇人,后来演变成了夫妻。这看似不太可能,但作者的故事叙述、细节设置、情感铺陈,使得这一切变得符合故事发展的逻辑。又如报信的“狼烟”一事,读者也会感到些许的不甚合理,但因为作者巧妙设置的悬念和细节,随着情节发展,就会发现,“狼烟”虽然死了朱大龙,也怒了司琴,还恨了陈泽,不仅情节有了推动力,人物关系的矛盾也有了尖锐性。这恰恰就是电视剧故事发展所必须的,等到矛盾化解,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进而会有“拍手叫好”的冲动。这时候,就不得不佩服作者构思的巧妙,布局的缜密,文笔的精巧。

《女政委》另辟蹊径的红色叙事,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惊喜和启发。(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